

富士康的“苹果”怎么样了？

廖省：林越

台湾企业“富士康”于1988年开始在中国大陆进行投资，鼎盛时期的总投资超千亿元人民币，在大陆有36个厂区，分布于昆山、北京、深圳、郑州、惠州等地，员工总数超80万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代工厂；苹果几乎将所有订单都交给它，还垄断包括iPhone手机、Mac、戴尔、惠普电脑等在内的很多硬件产品的生产业务，在中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2015年，为配合苹果供应链多元化，富士康老总郭台铭投资50亿美元在印度建厂，计划在5年内建设10至12个厂区，但进展不顺利，原计划的完成率不足20%。2017年，他又投资超10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像是给美国总统特朗普送去的一份“大礼”。2018年末，他信誓旦旦地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说，富士康将从占中国GDP的3.9%提升至5%。

但今年4月，媒体却报道富士康正加速离开中国，近期再向越南投资45亿人民币建厂，准备把中国的产业重心转移到越南，而大陆的80万员工将被辞退。富士康随即作出回应，称转移产业重心及抛弃大陆员工为无稽之谈，但外界对富士康的声明仍然存疑。

去年8月，由于中美关系紧张与新冠疫情，富士康开始将部分工厂迁到墨西哥；目前，在墨西哥有5家工厂。富士康总收入的54%来自苹果，苹果宣布要将亚洲的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及越南，因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有评论批评郭台铭对美投资、追随苹果在外国巨额建厂的行为是“商人无祖国”。对此他回应，“我觉得市场就是我的祖国。”“富士康在中国建厂，是给大陆赏饭吃。”这充满挑衅意味的狂妄妄语，加上他在美国对华为上禁令时，竟中止了替华为加工，无情落井下石的行为，使富士康在大陆的

形象直线大跌。

在中国惹了众怒后，富士康开始把国内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和越南。但其海外建厂计划却频频“翻车”，印度的疫情及产能拖累让他亏了近50亿！而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工厂，当时得到了100亿美元的承诺投资，最后却只有6亿到账，如今只好准备转型造车了。

苹果见情况不对，赶紧催促富士康把产能和iPhone 13的代工生产线重新搬回中国，富士康甚至贴出了紧急招工20万人的公示。显然郭台铭也醒悟了，中国受疫情影响较小，是世界公认的制造大国，拥有庞大的劳动人口和制造业基础；拥有全球最具活力的消费市场，同时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优质劳动力市场之一，富士康很难绕得开中国因素！

如今正值苹果的新产品销售旺季，富士康希望以中国的产能，弥补其海外工厂的产能匮乏；形势逼得富士康再业务移回

中国来，重启郑州工厂是唯一的选择。据悉，郑州富士康的苹果生产链本有90条生产线，年产近50万部苹果手机。这些设备可能都还完好。

但是，如今苹果的代工合作伙伴可不止富士康一家，还有和硕科技、比亚迪、立讯精密等。假如富士康没有足够的产能，苹果肯定会将部分订单分给其他的代工厂商。从郭台铭近期的行动不难看出，想要保持住在“苹果”的优势地位，富士康暂时离不开中国市场。

在富士康撤离中国的这几年内，有两个国产品牌迅速壮大，那是比亚迪和立讯精密。讽刺的是，成立于2004年的立讯精密，其创始人王来春是在富士康工作多年的女员工，辞职创办了立讯精密，她把郭台铭的座右铭“客商第一”改为“人才第一”，取得了成功。

业内人士表示，富士康的麻烦可能才刚开始。苹果目前的重要经营点都

在美国本土和欧洲市场，把中国市场放到第三位。而美国及欧洲绝大多数门店都处于关门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苹果的销售量出现了大面积萎缩，富士康以后的代工业务量会越来越来少。

同时，“苹果”接连出事，让富士康雪上加霜。据报道，欧盟向苹果发起了反垄断调查，或许会对苹果开具去年营收10%的罚单，而美国也开始对苹果发起了反垄断调查。今年4月27日，俄罗斯以垄断的罪名，给苹果下了9亿卢布的罚款；导致苹果股价下跌，不得不降低今年 AirPods 的产量。此前，苹果计划生产1.1亿件 AirPods，但如今可能降低到7500万件，这就意味着富士康的订单将减少，对富士康来说这是最为致命的打击。

如今的“苹果”没有以往抢手，富士康的声誉和发展也大不如前。何况来了两大竞争对手，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全球第

一代工厂的名声已受到威胁。不过，富士康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觑，这次越南和印度的失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意外，一旦疫情过去，富士康一定会重返越南和印度；因为在中国它已经很难再创辉煌，也就只能继续向外寻找出路了。

《国际日报》于25日报道：“台湾企业富士康(Foxconn)集团已作出承诺，有意在印尼投资于电动车电池项目。”“电动车电池工业是印尼政府在未来落实建设绿色经济和可持续性蓝色经济的政策方向之一。”希望富士康汲取教训，在印尼进行稳当的投资。

被咬了好几口的“苹果”，为疗伤自救，已顾不上提携“忠心”的富士康了；而彷徨的富士康只好冒险进军已被中国品牌占据40%的国际电动车电池，何况，中国开发的磷酸铁锂电池已赶超韩国日本专长的三元锂电池；富士康的新征程将充满挑战，再也狂妄不得。

巴厘：意如香

响应陈和“良禽择木而栖”

“人以类聚，鸟以群分”与“良禽择木而栖”异曲同工。鸟类有“鸟道”，彼此叽叽喳喳，构筑了一道野林旷野里，禽鸟和谐的蓝天翱翔美景。而“猛虎不吃犬子”，更是大自然生物生生不息的渊源传说，成为造物者构建大自然的伟大杰作。

陈和文友是东区文坛的一名写作好手，文章有分量，善写杂感文章，用词严谨，近乎鲁迅的杂文风格。他这篇“良禽择木而栖”，借群鸟的栖息习性，道出了“良臣择主而事”的人间“常态”，勾勒出人间充满猜疑算计，明争暗斗的阴险。对比与禽鸟，它们自由自在遨游蓝天，从

不离群，没有独居，没有相互猜疑，没有彼此算计，“鸟类比我们幸福多了”！

纵观环球，人与人，国与国，不是充满明争暗斗的阴险吗？为一国之私利，不惜兴兵侵略攻占别国，假借“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观”，行使霸权穷兵黩武。这些“民主人权”的教师爷，为达到霸权目的，拉帮结派，竟然使出最恶毒的“抹黑、造谣、污蔑”的三滥阴招，把中国新疆维吾尔的宗教和睦、民族和谐，污蔑为“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屠杀穆斯林”，企图煽动穆斯林国家对中国发起围攻，以孤立和削弱中国

的国际影响力。

但邪不胜正，欧美国家的世纪大谎言，欺骗不了国际上的正义人士，已经有两亿多国际人士(包括印尼伊联与穆协的穆斯林信众)到访过新疆，他们亲身体验了新疆是个好地方，宗教和谐，信众和睦相处，维吾尔族生育率全国居高，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事实胜于雄辩，因此至今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对中国的疆问题发出质疑的“抗议”之声，终于让欧美国家的世纪大谎言不攻自破。

反观世间人事，都有太多的人性污点，一些“道不同不相与谋”的人间怪事，

层出不穷。只因意见相左，互不苟同，就形成了深根蒂固的偏见，往往因了“一字之差”，一个名字也容不得，事事找咋为难人家。总不能静下心来相互体谅，相互谅解，反而一个又一个得罪了人而不自知，逼得双方愤而远离而去，“不相为谋”了。谁曾想？竟成了长夜绵绵，令人费解遗憾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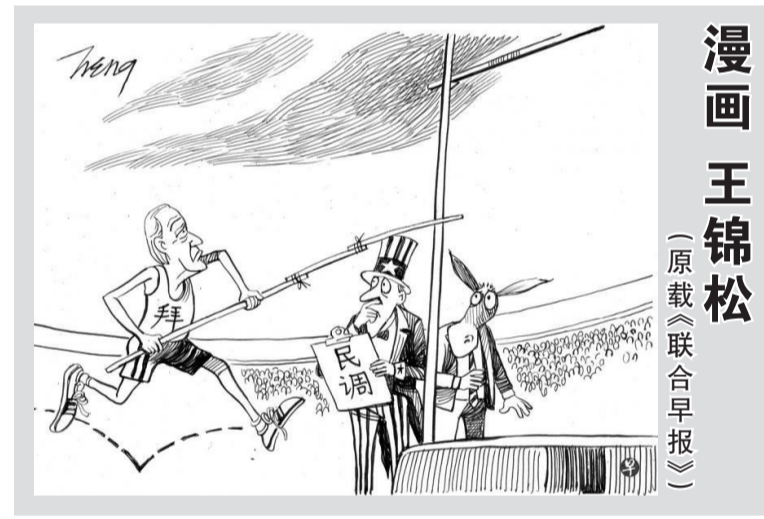
因此小心眼偏见害人不少，害得人际关系失和，为何一定要“老死不相往来”呢？难道“人道”不如“鸟道”吗？诚如陈和所言，树木被砍伐，两三个月之后会再枝繁叶茂，恢复以前的风姿，鸟儿也会再

飞来叽叽喳喳，没有猎人与猎枪，可以安心栖息了！

人呢？难道就不能抛开成见，虚谷开怀，容纳褒

贬，放下猜疑与算计之私心，放下过往的误解成见，得饶人处且饶人，和睦相处不好吗？

是该掏空偏见私心的阴暗，回归人性祥和光明了——愿与陈和文友和大家——相互勉励共勉之！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



有裨益(Ongkokham, 2008: 182-183)。因此，他们也汲取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学习荷兰语。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会欣赏和演奏西方音乐，甚至教导他们的孩子学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ues Mozart)和路德维希·凡·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等作曲家的作品。

最早关于华人精英阶层与古典音乐的记载出自荷兰作家佩雷拉尔(M.T.H. Perelaer)于1883年出版的作品《爪哇，荷属东印度》(摘录自 Ongkokham, 2008: 183)。据佩雷拉尔 Perelaer)在书中的描述，在庆祝1870年农历新年时，在郑家(Keluarga The)，一个泗水的印尼土生华人高级官员的家中举行西方音乐与舞蹈表演。有趣的是，虽然那个时代华人女性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但郑家的女眷却可以参与上述的娱乐活动中。可惜的是，关于郑家与古典音乐的关系并没有更深入的记载。在殖民时期的最后阶段，由于购买乐器、学习演奏乐器以及欣赏黑胶唱片的费用高昂，因此只有某些阶层的人能够欣赏古典音乐。

领军人物：黄仲涵的千金们

据迄今为止得到的数据显示，20世纪以来三宝垄一直保存着有关印尼华人与古典音乐的历史专利。也许是因为它是港口城市，西方古典乐团不时会来此处演出的缘故。除此之外，像留声机

古典音乐(1)

迪迪·瓜尔塔纳达(DIDI KWARTANADA)

和黑胶唱片这种新兴技术也已开始问世。

来自三宝垄的著名企业家、传奇人物黄仲涵(Oei Tiong Ham)(1866-1924)，鼓励他的女儿黄宗兰(Oei Tjong Lan, 1886年生)和黄蕙兰(Oei Hui Lan, 1889年生)学习欧洲音乐和声乐。黄仲涵的许多生意伙伴都是欧洲企业家，可能就是从他们身上他才知晓了古典音乐。有趣的是，黄仲涵不仅自己学习音符乐谱以及学习演奏乐器，他还允许两个女儿登台演出，进入公众视野。在那个年代，女孩登台演出被人们视作禁忌，因为华人女性一进入青春期就被关在家里，深居简出之中(End, 2006: 199, 778)。也许黄仲涵想向社会各界表明，他是一个紧跟时代步伐，思想开明的进步人士。

黄仲涵将两个女儿送到新加坡学习古典乐，那么宗兰和蕙兰的首次演出也在新加坡举行。《新加坡日报》、《东方每日邮报》和《海峡晨报》都于1905年12月7日报道了在旧市政厅举办的一场小型音乐会，这是由著名音乐老师巴塞特·阿雷尔(Bas-set-Arrall)夫人的学生演奏的。这对年龄分别为19岁和16岁的姐妹同其他

的学生一起演出。演奏厅座无虚席，新加坡总督作为贵宾也受邀出席。下面是由这对姐妹为大家带来的几首乐曲：

《慈爱》：
黄宗兰和黄蕙兰二重唱
《少女之歌》(杜邦(Dupond)作品)：
黄宗兰(钢琴独奏)
《蝴蝶》(华尔兹舞)：
黄蕙兰(歌唱)
《合唱团》：
学生合唱，其中黄宗兰担任女中音，而黄蕙兰则担任女高音
《浪漫曲》：
黄蕙兰(歌唱)
《鞞鞞进行曲(格雷奇(Grech)作品)：
黄宗兰(歌唱)
《小夜曲》(古诺(Gounod)作品)：
黄蕙兰(歌唱)，黄宗兰(钢琴)伴奏
《挪威婚礼进行曲》：
黄宗兰(钢琴独奏)
《东方每日邮报》对黄仲涵的两个女儿给予特别点评，称她们在歌曲《慈爱》中所表演的二重唱“对于新加坡来说宛若一种新事物”，两种嗓音的完美配合更是为当晚的观众们带来了特别惊喜。这对姐妹出色地表演了这些难度系数非常高的乐曲，不仅赢得了观众们的欢呼喝彩，也使得辛勤教导她们的老师感

到欣慰。黄宗兰用钢琴演奏杜邦的作品同样也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最后，黄蕙兰向说英语的观众们完美演绎了一首法语歌曲《蝴蝶》，并获得了特别称赞。后来，黄蕙兰以著名中国外交家顾维钧(V.K. Wellington Koo)太太的身份更为人所熟悉。在国外成功获得赞美后，黄仲涵鼓起勇气向家乡三宝垄展示他的女儿们的才能。

1907年3月，黄蕙兰自己出面为当地的中华会馆(THHK, Tiong Hoa Hwe Ko-an)学校筹集资金，她两位来自新加坡的12岁表妹为她的表演作钢琴伴奏。殖民政府华人事务顾问亨利·保罗尔(Henri Borel)也观看了这场表演，他评价道，这场表演是荷属东印度的华人女性进步的标志，但他也提醒道，对于一部分华人社会来说，女性在公共场合演出还是欠妥(Borel, 2017)。两年后，黄宗兰、黄蕙兰两姐妹才正式开始在三宝垄登台演出，并由陈秀莲(Caroline Valentine Tan Souw Lien)、陈依薇(E.V.Tan)两姐妹陪同，她们都是黄仲涵志同道合的朋友陈传顺(Tan Toan Soen)的女儿。这段四重唱表

演演唱了法国作曲家的作品，目的是为了给美西那(Messina)[位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区(Sisilia)]和中国的灾区筹款。这场演出进行的非常顺利，筹到了超过4,000荷兰盾的善款(“Wat de Chinese Vertelt”, 1909)。

黄仲涵对两个女儿所采用的开明进步的教育方式，获得了后来的民族女英雄卡蒂尼(Raden Ajeng Kartini)的高度赞许。在1902年1月3日给于娘阿本达依女士(Ny.Abandanon)的信中，卡蒂尼称赞黄仲涵，说他既是一位乐善好施、济贫救危的慈善家，同时也是一位培养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女儿们的父亲。(Kartini 2000: 219)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黄蕙兰与父亲黄仲涵